

# 秦汉法制史研究

〔日〕大庭脩·著 林剑鸣等·译



# 秦汉法制史研究

〔日〕大庭脩 著

林剑鸣

王子今 黄小芬

田旭东 张懋谔

周苏平 刘夫德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顾孟武  
封面装帧 邹纪华

秦汉法制史研究

〔日〕大庭脩 著

林剑鸣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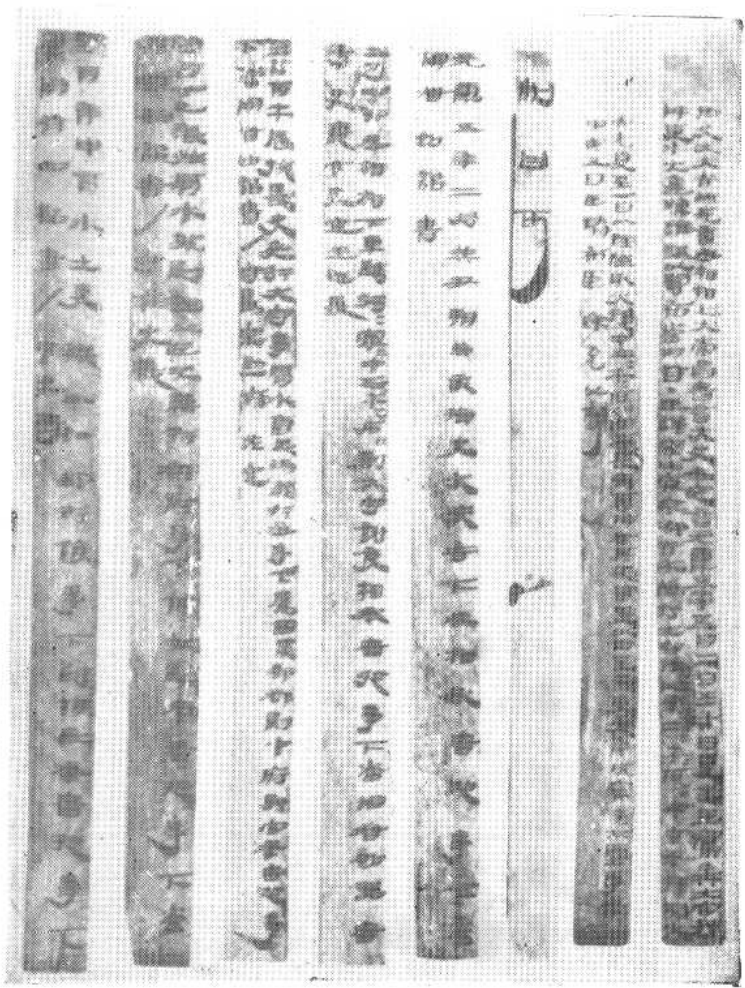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8.75 插页 8 字数 461,000

1991年3月第1版 1991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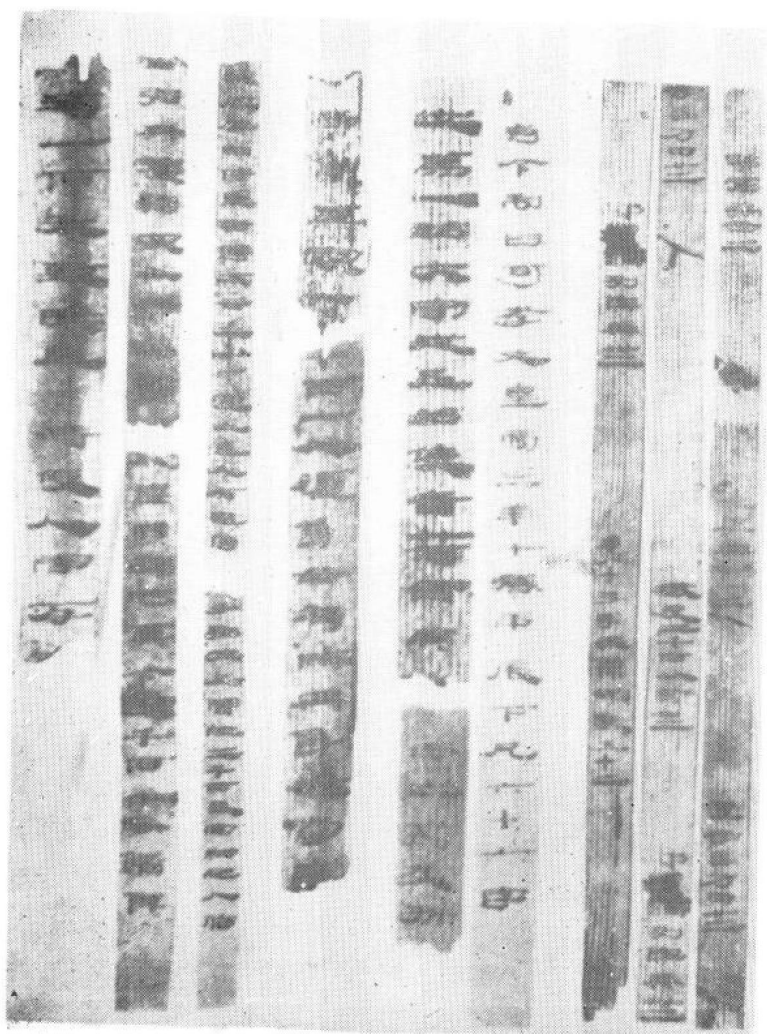
ISBN 7-208-00737-3/K·148

定价：10.75元



元康五年詔書冊(參照 200 頁)

圖版一



(4) 上(7) 上(1) 上(12) 上(3) (18)  
 下(11) 下(2) 下(10) 下(14)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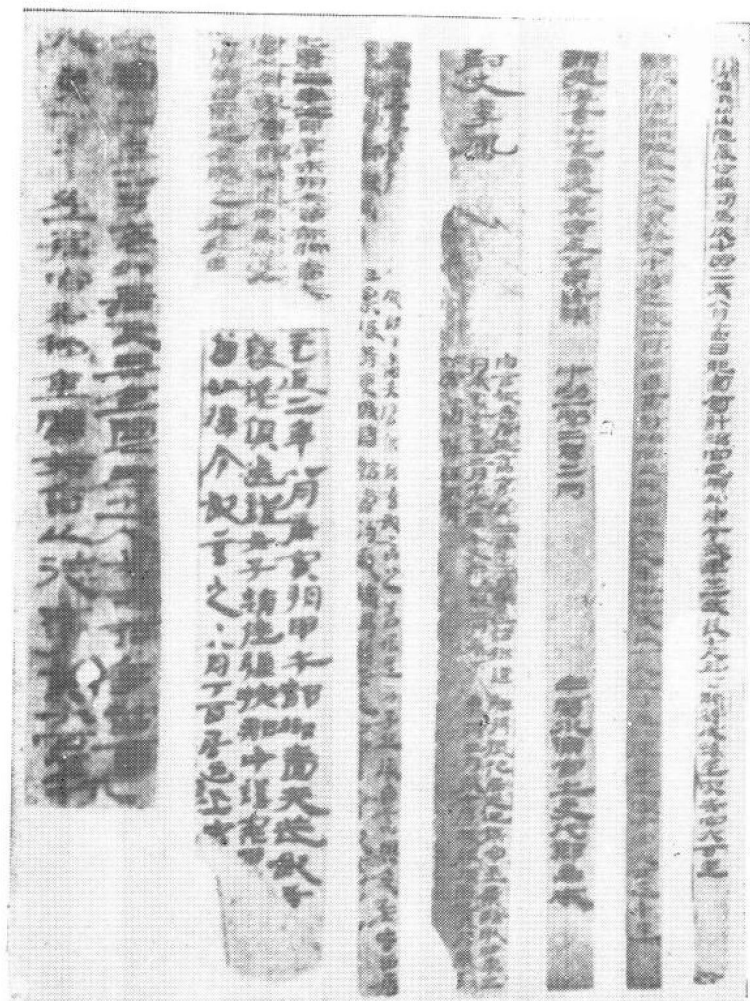
诏书断简(参照第3篇第3章)

图版二



律之一 律之二 律之三 律之四 律之一 律之二 律之三 律之四  
 记有律令的简(参照第2篇第2章)

图版三



4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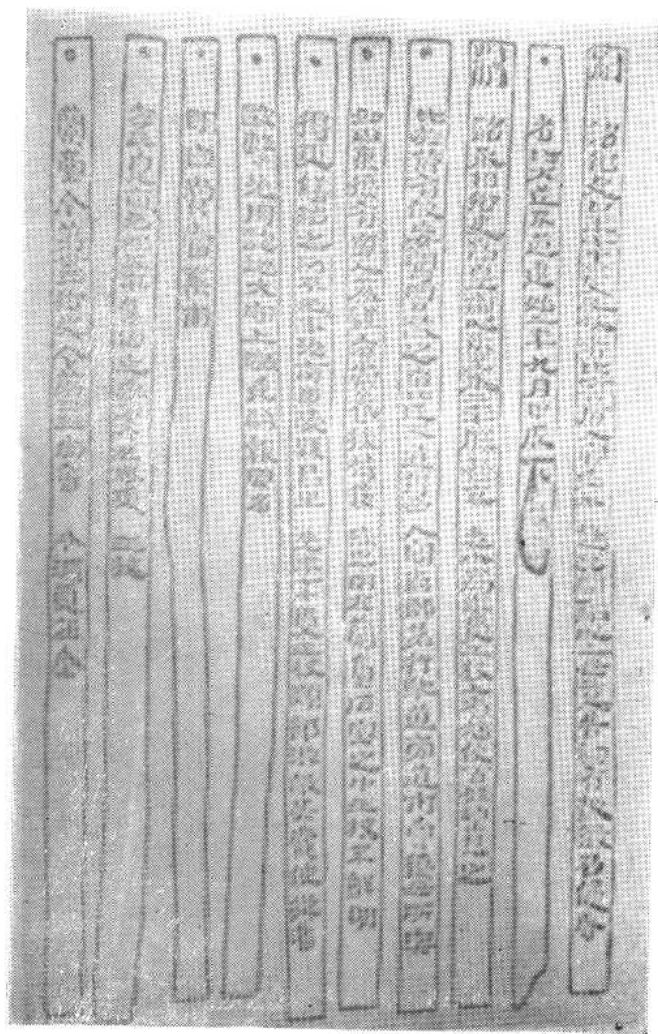
(13)

上487页(2) 417页 512页 406页 449页 449页

下487页(3) (17) (30) (4) (2) (3)

功劳文书·爰书·过境符券

图版四



10 9 8 7 6 5 4 3 2 1

图 2

图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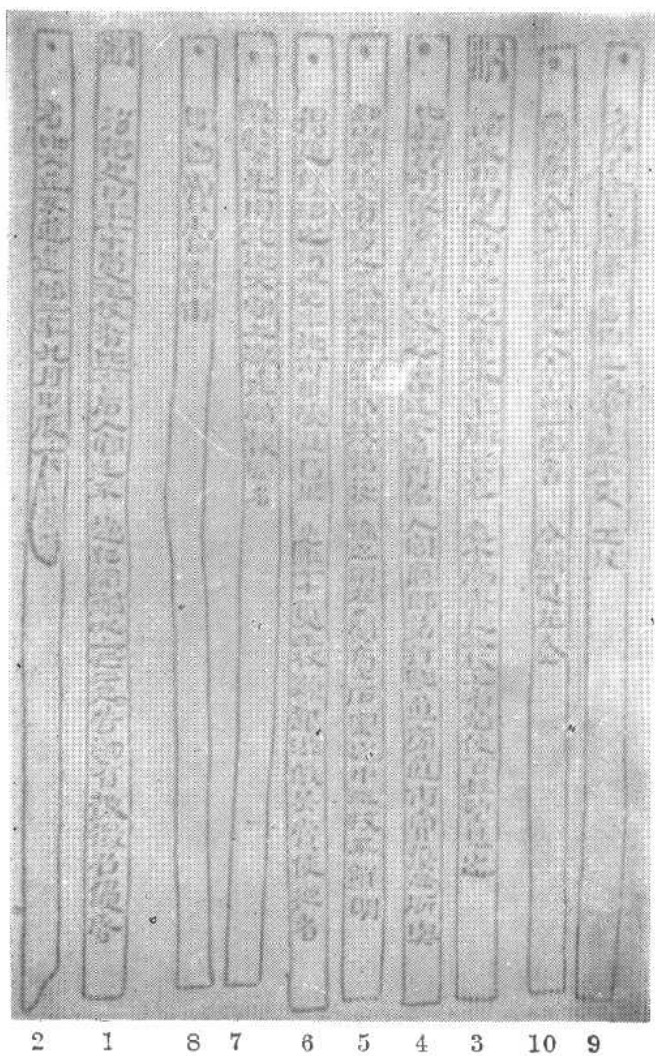


图 3

图版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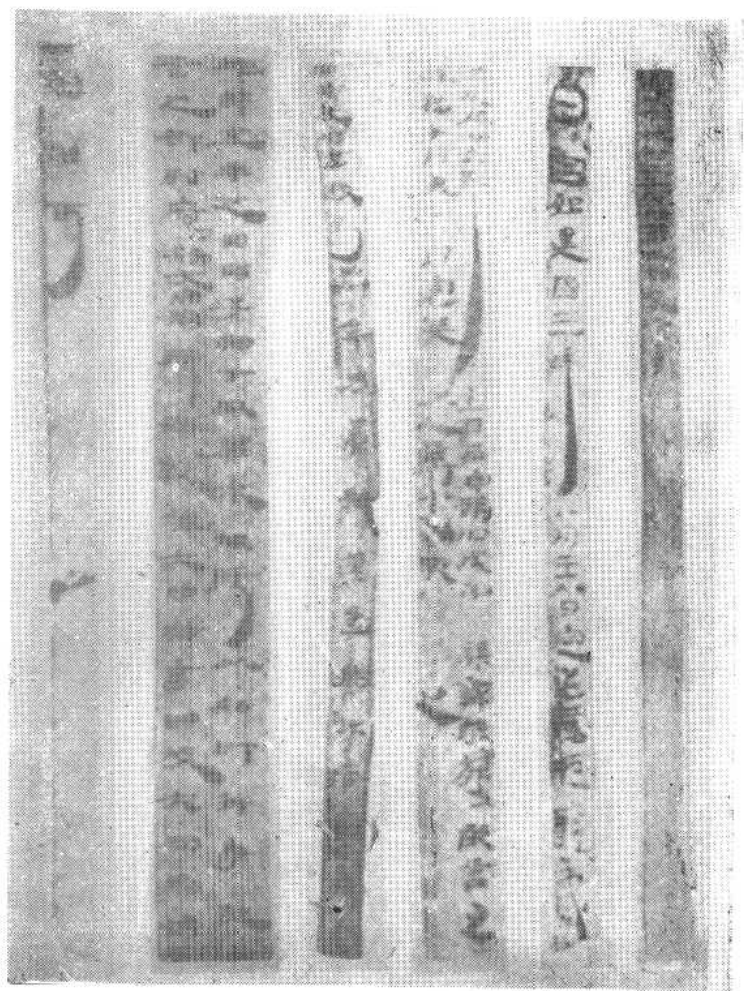


图9

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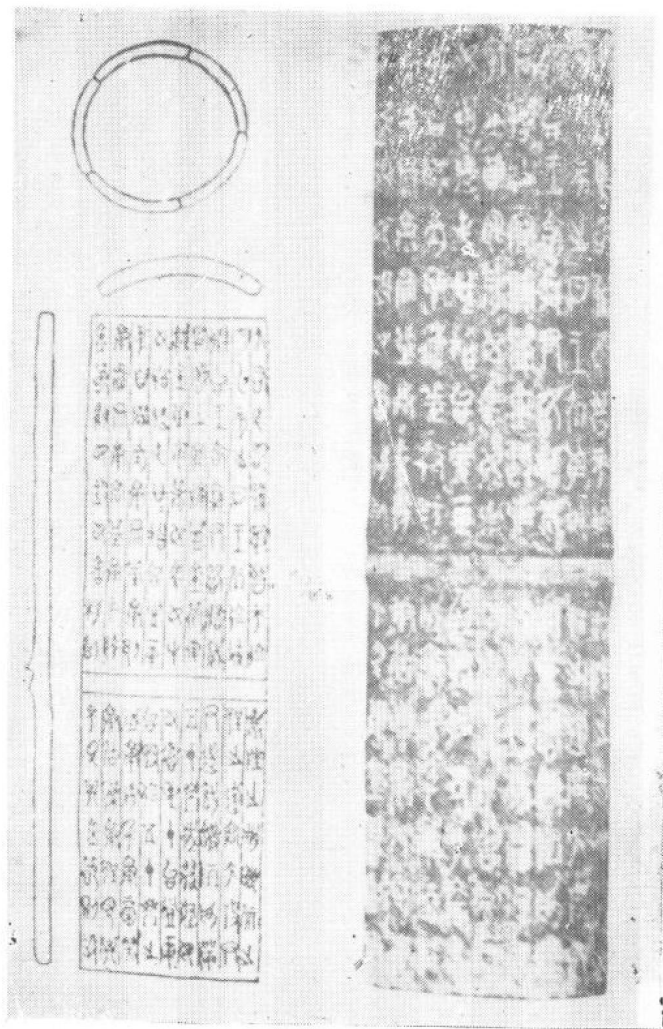
图7

图6

图5

图4

图版七



鄂君启节——车节

2

1

1. 实物照片载于《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2. 原图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

图版八



图12 汉画像石上所见之节

上图马右所立者,即乘左面马车而来,是汉使者,其右手所持就是节。这是林氏所指出的。

下图中间人物所持者,与上图比较,看上去属于同类,可以认为也是节。

图版九



(2) 魏率善俊伯长



(1) 魏率善氏伯长



(3) 亲晋光王



(4) 晋鲜卑率善中郎将

图 14 所谓蛮夷印

图版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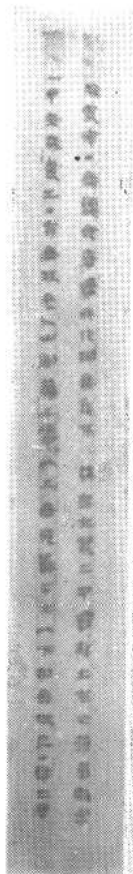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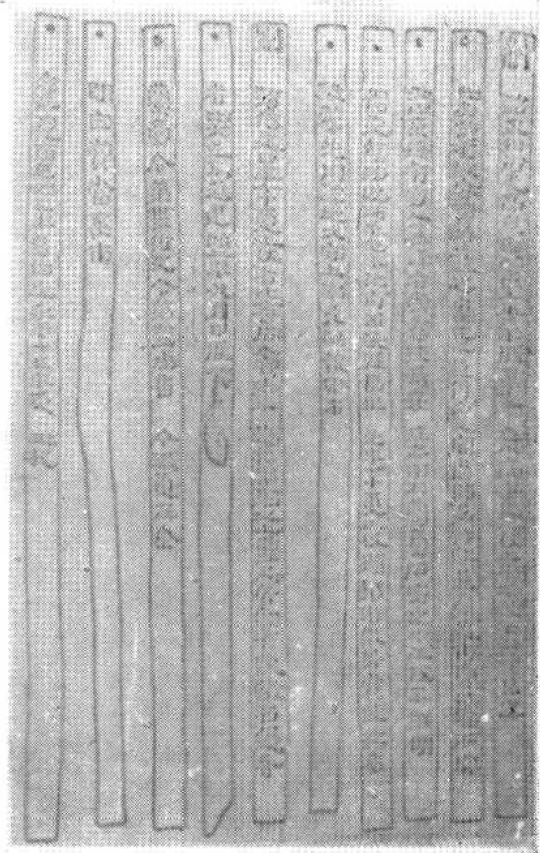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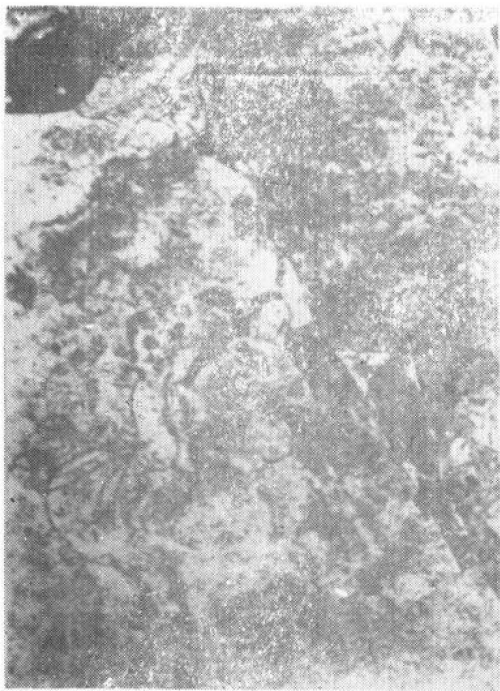


图10



9 8 10 2 1 7 6 5 4 3

图11



上：辽阳发见的汉墓壁画  
 （取自驹井和爱《辽阳  
 发见的汉代坟墓》图  
 版十一）。骑马人右方  
 所画，分上下二段，上  
 段墨涂，下段朱涂，我  
 认为是节。



下：幢？（取自Mission Arche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  
 par Edouard Chavannes Pl. LXV.）车后随从二骑所扛者，我  
 认为是幢。

图 13  
 图版十二

6, 25, 56 / 23

## 译者序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大庭脩博士的名著《秦汉法制史研究》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迄今为止,研究秦汉史的专著虽已有几部,研究法制史的专著在国内外也多得不可胜数。然而,深入、系统地研究秦汉法制史的著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则只有大庭脩博士的这一本。提起来不能不使我们中国学术界人士汗颜,就连我们中国,至今也没有一本秦汉法制史的专著。仅此一端,即可看出这本《秦汉法制史研究》在中国出版的重要意义了。

大庭脩教授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世界性学者,他所研究的领域极广:汉简、秦汉史、法制史及中日关系史均有专著出版,由于他对学术的贡献,曾于1986年获得日本学术研究的最高荣誉——“学士赏”,这一桂冠每年只给予各学科最有成就的学者,而由全国最高学术机构进行极其严格的评选后选出,在天皇前颁奖。大庭脩博士的学术著作在世界上有极广泛的影响。他本人曾到美国和欧洲等国讲学和进行长期研究。他对中国更有很深的感情,在大陆和台湾都有大庭脩教授的许多朋友,台湾的学者把大庭脩教授称之为“史学泰斗”,大陆的著名学者陈直、杨宽、林甘泉、李学勤等与大庭脩教授皆有颇深的交谊;复旦大学、辽宁大学、西北大学以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国考古学会、中日关系史学会多次邀请大庭脩教授来中国讲学、访问。而大庭脩教授在大陆、台湾和世界各地始终不懈地为弘扬中国古代文化、促进中国与日本及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友好往来而奔走。大庭脩教授不愧是中国人民值得信赖的朋友。



这一部《秦汉法制史研究》是大庭脩教授的力作，在日本国内外均曾获得极高的评价。本书的特点是以考证史实为主，其研究方法是以传统的历史文献为基础，广泛搜集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进行细密的考据。这是中国传统的乾嘉学派与现代科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古文献根底，而且必须掌握丰富的、最新的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并将这两者十分恰当地联系起来。这是一条十分艰辛的治学途径，没有多年积累和“皓首穷经”的精神是难以达到目的的。不要说是一个外国人，即使是走这条治学之道的中国学者，目前也为数不多。当我们中国大陆学者普遍感到“史学危机”的时候，出版这本日本史学界“实证派”的代表作，相信会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刺激和启发的。无庸讳言，日本学者在研究问题的方法、观察分析问题的角度等方面，与中国学者有相当大的差异，加上语言、文字的不同，很难要求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在对古代资料的理解与掌握方面完全一致。因此，书中有某些一时尚不能为中国学者接受的论点，也是不足为奇的。相信通过更多的交流，将会促进双方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译者曾于1985年应邀到日本访问并与日本朋友进行交流和共同研究。在关西大学与大庭脩博士一起参加《木简研读班》，并开始翻译《秦汉法制史研究》。回国后，又与我的学生一起，集中一年时间将这本著作译出。前后参加译书的有：王子今、田旭东、张懋镕、黄小芬、周苏平、刘夫德。在出版过程中，全书译文由谢宝耿、蔡振扬两先生进行审校。因此，这是一部集体完成的译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本书翻译和出版方面给以很大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最后，还要说明：本书中译本出版前，大庭脩教授曾向日本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书面报告，请示是否允许在中国出版；得到对出版中译本不加干涉的允许。

林剑鸣

一九八八、五、十